

郑文——献身中山统战事业的香港同胞

郑文（1915—1945），香港人。1938年在香港加入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后转到中山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历任中山九区大队第九中队政治指导员、大队副政委，1945年在黄埔尖峰山被顽军杀害。

郑文原是香港洋行的职员，工作稳定、收入不薄，在洋行工作的经历养成了他待人温文尔雅、谦逊有礼的良好品性，他的人生本来处在阳光路上，前途无限光明，但是随着1938年日军进犯华南，占领广州，威胁香港，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当时香港广大爱国同胞积极投身抗日，捐钱捐物甚至亲自参加抗战，郑文亦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潮中，由于表现积极，1938年被香港的党组织吸收为中共党员。香港沦陷后，郑文转入内地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先在西江一带活动，后加入顺德广游二支队。1942年5月，中山抗日游击队在五桂山成立，大队下辖两个中队120多人。郑文在其中一个中队做思想政治工作。他善于用富有鼓动性的语言和丰富的人生阅历来激励游击队员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战斗，战胜困难，打击日寇，给游击队员们带来了勇气、希望和一次次的战斗胜利。

1943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他被调到九区梁伯雄大队第九中队任政治指导员，中队长是吴桐。梁伯雄大队是在中山九区筹建的一支既隐蔽又公开、挂国民党“别动大队”（后称“民利公司”、“挺三”）番号的实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大队所在的九区，环境很复杂，敌伪顽相互勾结，因此，对他们来说，政治斗争比军事斗争更复杂，稍有不慎，就会招致麻烦，陷入孤立困难的境地。而且在这里吃喝嫖赌泛滥，干部战士很容易受影响被腐蚀，这就需要部队做大量细致而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为此郑文作为政治指导员一直活跃在游击队员们的中间，在部队中开展革命乐观主义、政治纪律教育，收到很好的效果。当时部队生活已经十分艰苦，只能靠吃番薯叶、芭蕉树头果腹，很多人出现营养不良、水肿，而敌人又不停地进行梳篦式的扫荡，战士们一个晚上常常要转移几个地方，吃不饱睡不稳，这种情况下，战士们仍然坚持斗争、团结一致，没一个掉队，也没一个离队，非常难得。

郑文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军队干部，处处以身作则。他身体瘦弱，眼睛近视，戴着眼镜，行动不方便，而且营养不良，经常生病，但他坚持和战士一样早上四点半钟起床，吃完早饭进行军事训练。部队上午上课（政治课或军事课），下午训练，生活很紧张。郑文负责部队的政治课，他讲课生动形象，深入浅出，战士们容易接受，效果很好。他关心同志，和蔼可亲，经常深入到战士中，与他们交流思想，帮助他们解决困难，深得战士的爱戴，享有很高的威信。

为了改善部队恶劣的生存环境，郑文还要做好当地的统战工作，努力争取同情我党我军抗日斗争的进步人士。当时进步青年梁茂鸿在九区积极为我党工作，郑文负责与他联系。梁茂鸿的舅父吴兆华是当地的大耕户，率领一支部队驻防陈十顷一带，陈十顷是五桂山区通往东江的交通要点。如把吴兆华争取过来，对抗日是很有好处的。郑文通过梁茂鸿的介绍与吴兆华见面，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吴兆华来黄圃治病时，郑文又亲自来向他问候，做抗日统战工作，吴兆华态度有所转变。当“市桥皇帝”李朗鸡汉奸军大举进犯中山九区时，吴兆华就把队伍带到十区三墩，交由郑文指挥，配合作战，保证了战斗的胜利。郑文和九区群众的关系也非常好，他借宿在贺富家时，贺富对郑文如对儿子一样，在食宿各方面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

1944年1月，南番中顺游击区指挥部将梁伯雄大队中的第二中队和主力留守队合并，编为指挥部领导的九区大队，仍由梁伯雄大队掩护。郑文被任命为副政委兼教导员。1945年1月珠江纵队成立后，九区大队归珠纵一支队领导。由于梁伯雄大队在抗日战场屡建奇功，因此成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心腹大患。1945年5月23日拂晓，国民党“挺三”出动四个支队兵力，向梁伯雄大队发动进攻。梁伯雄大队奋起还击，以少敌众，十分英勇。战至下午，阵地仍岿然不动。24日，“挺三”增兵，共3000多人进攻梁伯雄部100多人，由于敌我力量

悬殊，梁伯雄部伤亡惨重，大队长梁伯雄牺牲，政委蔡雄、副政委郑文等率 30 多名战士冲出重围，转移到九顷，继续与敌人激战。由于退路被敌人切断，他们决定分散隐蔽。26 日，郑文负伤被捕，被押到观音冲“挺三”第四支队驻地。郑文面对国民党顽固派毫无惧色，严厉斥责他们破坏抗日、残杀抗日军民的罪行。国民党顽军理屈词穷，对他严刑拷打，他忍着剧痛，视死如归。期间，梁茂鸿等人试图通过潘浩（大天二潘惠的亲弟）出面保释，但不成功。26 日晚，郑文在黄圃尖峰山被顽军残酷地杀害，刽子手共开了 6 枪，他才最后倒下。牺牲时他年仅 30 岁。

郑文爱党爱国，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回国抗战，凭借自己的人格魅力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和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为中山九区的抗战胜利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作出了突出贡献。

中山党史